

表 8 郑观应家族买办成员及其关系

姓名	与郑观应的关系	生卒年	任职洋行
郑文瑞	郑观应之父	1812—1893	上海宝顺洋行
郑秀山（廷江）	郑观应之叔父	1842——1922	上海宝顺洋行
郑翼之（庆麟）	郑观应之弟	1804—1870	天津太古洋行
郑思齐（济东）	郑观应之兄	1827—1865	上海宝顺洋行
郑思贤（耀东）	郑观应之弟	? —1856	上海礼和洋行
郑官桂（月岩）	郑观应四弟		九江宝顺洋行
郑庆蕃	郑观应之六弟		轮船招商局船
郑庆寿	郑观应之七弟		彭玉麟军营务处
郑庆镗	郑观应之八弟		梧州招商局
郑庆余	郑观应之九弟		招商局厦门和福州分局
郑慈荫	郑观应之侄，郑翼之三子		天津太古洋行
郑宗荫	郑翼之长子，郑观应之侄		天津太古洋行
郑润林	郑观应之长子		招商局厦门分局

资料来源：易惠莉：《郑观应评传》、《郑观应和他的家族》，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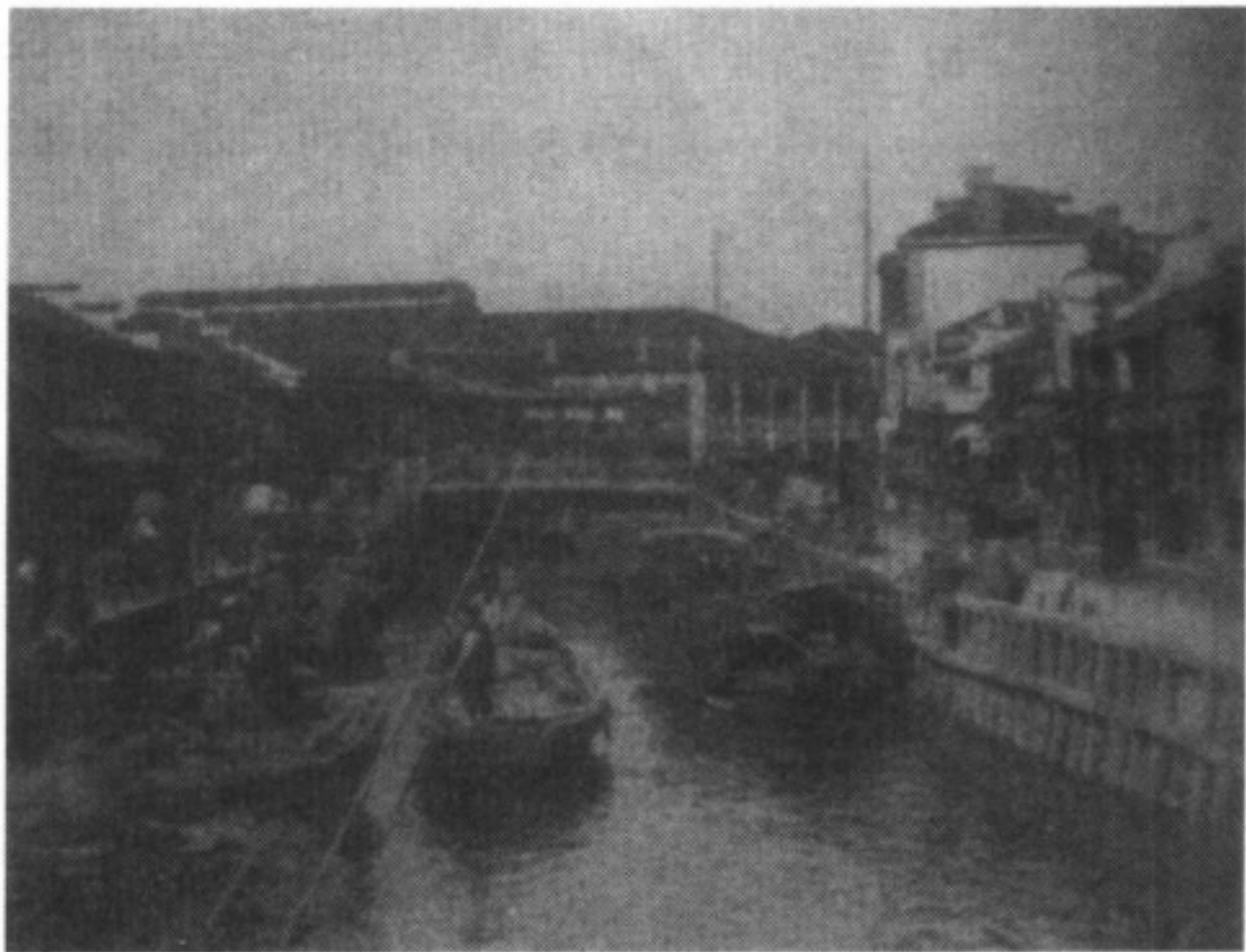
香山买办这种为同族同乡作担保，举荐担任洋行买办的做法，已为时人所察觉。当时的一位评论者就说：“几乎所有外商雇佣买办都是（香山）这个县的人，这些人介绍的雇员自然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家乡。”^① 香山买办就是这样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语言优势，以地缘、血缘等关系为基础，逐渐编织成巨大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在迅速膨胀的沿海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社会中盘根错节，牢固地控制着开埠初期通商口岸各国洋行的商贸活动。香山买办群体的结构与特征因而也打上了宗族性和地缘性的印记。

二、香山买办的活动及其特点

活跃在 19 世纪上海地区的香山买办，其形成过程虽然也似江浙一带的买办群体一样，具有浓厚的地缘性和宗族性，但他们的商业活动更带有较大的冒险性和开拓

^① 英特：《中国商埠志》，第 135 页。

性。香山人不仅较早地充当包括上海在内的通商口岸洋行的买办，几乎垄断了上海等通商口岸的早期中外贸易，特别是丝、茶方面的贸易，而且还率先以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者、投资者和实业家的身份，参与中国近代工商业方面的重大活动。有的研究者就指出，作为洋行的雇员，他们像其他地区的买办一样帮助洋行拓展在华业务；作为东西方之间商业的中介人，他们在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上海的洋泾浜

事实上，除具有近代买办的一些基本特征和作用外，香山买办还较早地涉足于近代工商企业，表现出传统中国人少有的投资新式工商业的热情。在买办商人向近代民族资本转变的过程中，香山买办无疑地起到了示范带头的作用。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不仅对发展上海经济，建设上海近代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经营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开埠初期的上海居民的社会生活，加速了上海城市近代化。

受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影响，香山买办群体在上海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洋行贸易活动有关的事务上。特别是在茶叶和生丝等业务上，香山买办比江苏和浙江以及上海地区的买办似乎更有优势。^②香山买办群体在上海的商业和投资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明显地表现为以地缘和依附政府为权利扩张的基础，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企业，成为重要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其身份和角色因此也发生了变化。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香山买办的商业和投资活动的性质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31—186页。

② 浙江买办专营丝业，江苏买办集中在银钱业，广东买办则精于茶叶等方面的生意。买办商业专业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其一，从洋行总管转变为业务副手。

鸦片战争前，上海因长江三角洲发达的茶叶、蚕丝、棉花、米粮贸易活动和在沿海贸易上的关键地位而成长。^①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它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批外商。各国商人纷纷到上海设立商行，拓展对华贸易的领域。但是，自由贸易活动并非如洋商想象的那么简单，语言的障碍，货币的复杂，度量衡的多变，以及市场行情的诡秘和社会历史文化上的隔阂，使洋商不可能独立地开展对华贸易。因此，“外商去新辟口岸时，通常带上他们的广东买办和其他雇员，包括厨师，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从前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广州伙食合外商的口味”^②。而且洋行的资金担保制度，也十分有利于外商继续雇佣广东人充当他们商行的买办。

19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每个买办都必须有人作保，或者以押金担保。他们的保证人对于他们在商业交易上的诚实和资金偿付能力负有全部责任。这种“作保”和“被保”活动的前提，只能是作保人和被保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依靠和相互制约。为避免作保人因担保招致损害，同姓相携和同乡相助，也就成为香山买办的必然选择。香山人也在这种长时期的商贸活动中，形成了以宗族性和地缘性为特征的买办群体和社会关系网，并逐渐出现了唐氏、徐氏、郑氏和莫氏等家族这样几代充当洋行买办的买办世家。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抱怨说：“我刚到上海，就立刻注意到广州的一些人已经纷纷来到这个口岸，并且把广州流行的许多最坏的习惯和观念，也带了进来。”亦即“非常普遍地倾向于结成行帮来和外国人进行贸易”^③。由于粤商大都熟悉对外贸易业务，因此他们乐意为他们的同乡任买办作担保。而粤籍买办中，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和诚实可靠，尤其受外商的信任。1859年约翰·侯德给阿尔伯特·F. 侯德的信中就称：“上海买办根本不可靠。不过他由我们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们的老买办（莫仕扬在广州）作的保。”^④ 也就是说，只要是广东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保荐的人，就可以放心使用。这足以说明，香山买办在外商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正是出于对广东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的信任，开埠初期的上海外国商行，大都

① [美] 罗兹·墨非：《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3页。

②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60页。

③ Wright, S. F.: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P. 84.

④ 转引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60页。

愿意雇佣香山人做买办。鸦片战争后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洋行数量逐渐增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 19 世纪 40 年代约有洋行 40 家，到 1864 年增加到大约 150 家，1872 年增至 343 家，1894 年增至 552 家，最多的年份 1893 年为 580 家。^① 在地域分布上，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到 1894 年，实际开通商口岸从 5 个增加到 25 个。^② 这些新增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蒙自、龙州、亚东等在 1894 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 13 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仅内陆汉口，到 1892 年时就有洋行 45 家。^③ 而且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1865 年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1865 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传统业务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④ 洋行的增加，必然导致买办人数的增加，据现有资料记载，各洋行在 1860 年以后雇佣的买办人数及其占 1831—1894 年所雇佣买办总数的比重为：旗昌洋行 17 人，占 80.95%；怡和洋行 21 人，占 70%；宝顺洋行 14 人，占 66.67%；琼记洋行 11 人，占 55%；其他各洋行买办 72 人占总数（除 1894 年以后雇佣者以外）90%。外资银行在 1865 年后所雇佣的买办 27 人，占总数（除雇佣时间不详者 3 人外）的 90%。外资轮船公司在 1865 年后所雇佣的买办 15 人，占总数（除雇佣



1868 年的香港怡和洋行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00 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第 735—736 页。

③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7 页。

④ 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1 页。

时间不详者1人外)的88.24%。^①

当时,在上海比较大的洋行,如琼记洋行、宝顺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都雇佣香山人做买办。在怡和洋行上海分行,先后任买办的香山人有林钦(?—1863年9月),唐廷枢(1863年9月—1873年6月),唐茂枝(1873年6月—1897年7月)和唐杰臣(1897年—1904年)等。^②在宝顺洋行上海分行,也是香山籍买办占优势。香山人徐钰亭、徐荣村、徐润等先后担任该行买办,并成为洋行的业务骨干。太古洋行上海分行买办职位,同样为香山莫仕扬及其家族成员所垄断。这个时期在上海外国商行里任职或做买办的香山人也很多,如郑观应兄弟和容闳等人,均是上海开埠后进入洋行的。香山买办在其任期内,也算得上尽职尽责,不仅充当洋行的司库、推销员、翻译、托运经纪人和情报员,而且亲自赴内地采购茶叶、生丝、棉花等土产,甚至管理洋行的各种业务。唐廷枢自从接替林钦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其活动内容和范围就不仅仅局限于此。他经常访问其他条约口岸,帮助洋行在其他口岸解决同华商的争执,甚至主持怡和洋行的航运、保险和向钱庄“拆票”等方面的业务。^③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和诚实可靠,明显地得到了洋行大班的信任和肯定。约翰生就在给香港W·克锡的信中称:“我发现有时候我可以把我们的现金节余投放到中国钱庄的庄票上去,这种庄票在三至七天的短期内就能兑现,利率是从12%至15%不等,并且我认为相当安全,因为我对任何一家钱庄庄票的贴现,都不会超过10000两或15000两……我知道这种生意的成功全赖我们买办的聪明和可靠。”^④宝顺洋行的香山买办徐润,因为勤奋好学、精明能干,赢得了洋行大班的器重。他在接替刚去世的副买办曾寄圃之职时,大班韦伯就表示“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唯老买办在行必须一一禀告。……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唯君是问”。在薪金方面,在原来400两银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两以示优厚。^⑤徐润在宝顺洋行上海分行任总买办期间,显示出的非凡才干,使美国旗昌洋行的大班们也动了招贤纳才之心,曾试图雇佣徐润为旗昌洋行在上海的总买办。

①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161—178页资料统计。

② 转引[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62页。

③ 转引[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00—106页。

④ F.B. 约翰生(上海)致W·克锡(香港)函,1868年5月20日,怡和档,转引[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02—103页。

⑤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5页。

1873年6月F.B. 福士就说：“我正努力把阿润（指徐润）弄来，但愿成功，虽然他同中国公司（轮船招商局）的关系是一个严重的困难。”^① 尽管福士的努力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从中亦不难看出香山买办在外商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像众多近代买办那样，香山买办既是洋行的雇员，又是独立的商人。

通常，“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②。“对买办自己的营业，洋行一般是采取放任态度，有时甚至采取纵容和鼓励的态度。”^③ 因此，买办往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洋行的支持，开设新的属于自己的独立商号。到了19世纪60年代，“买办自立行号，已成为很普遍的大量现象。”^④ 因此，“有些买办与洋行之间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⑤。香山买办较早涉足的商贸领域是茶、丝和鸦片。茶业和丝业是香山买办最熟悉的传统经营领域，香山买办中的徐氏家族、唐氏家族，乃至郑氏家族，均是从经营茶、丝等业务起家的。在近代中国早期，占出口总额最大比例的货物是茶叶和生丝。香山买办最初的商业活动大都与这两种商品的中外贸易有关。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已在福州、厦门、上海、汉口、九江等通商口岸从事丝、茶的经营。他们经营着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各省生产生丝、茶叶收购、贩运工作，他们雇用至亲好友担任行内业务和各处产茶区“座庄”（收购站），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有些在产区设厂，进行茶叶分拣、焙炒、分别等级的初级加工，将成品分类包装之后，再运到各处口岸存仓，参与茶叶市场的交易。^⑥

徐润在上堂帮账时就尝试自己经营商号，早期与其师买办曾寄圃合开一家绍祥字号，到内地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然后转卖给上海洋行，从中牟取利润。因徐润熟悉茶叶和生丝业务，又了解市场行情，因此在充当宝顺洋行买办的同时，他又相继开设了润生、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茶号。这样既满足了宝顺洋行的需要，又为其他洋行提供了好的货源，自身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可谓一举多得。除此之外，徐润还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顺兴、川汉等货号，经营茶、丝、烟叶、皮油、

① F.B. 福士（上海）致S.G. 罗斯函，1873年7月22日，F.B. 福士简函。转引〔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32页。

② 《北华捷报》1865年9月16日，第146页，转引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21页。

③ 转引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22页。

④ 严中平：《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选辑》1979年第1辑，第112页。

⑤ 《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片断史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2页。

⑥ 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第15页。

白醋、黄麻、桐油等货，在上海二马路与人合股开设宝源丝茶土号，经营丝、茶、鸦片。另外他还先后与人合股开设了敦茂钱庄和协记钱庄，办理存款放款，开发庄票和兑换等业务。可以说，徐润做买办与经商二者相得益彰。唐廷枢在为怡和洋行拓展业务范围的同时，也先后投资于泰和、泰兴和精益三家钱庄，还与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他的商业活动范围涉及典当、钱庄、保险，以及丝、茶、棉花贸易和漕粮运输等领域。徐润的叔父徐荣村兄弟，是最早到沪闯荡并因此发迹的香山买办之一。他们的经营重点是丝和茶，尤以“七里湖丝”为贸易中之重点。徐荣村更是办事认真，经商有道，对自己经营的丝茶等物“详加咨访，审择再三，一丝一茶，必居上品。……积日既久，丝之纯驳，一望而知，虽苕 养蚕之家，苏宁世业之匠，匪特不能蒙公，且有闻所未闻，叹为不可及者。”^① 1851年得知英国宣布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徐荣村精选了12包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展，一举夺得金、银大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奖牌和奖状。^②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停业后，也一度在和生祥茶栈做通事，并投资于轮船业和贩盐业。^③ 为了控制茶叶、生丝和鸦片贸易，徐润和唐廷枢等人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并兼任董事，试图通过公所的权势对上海和周围广大地区的丝、茶、鸦片贸易行业进行控制和垄断。各口岸的公所“会同上海董事，互为维持”，^④ 操纵市场，牟取暴利，经营茶、丝和鸦片贸易，为香山买办带来了大额利润，同时也赢得了洋行的信任和商界的盛誉，从经济上增强了香山买办在上海洋行和商界中的整体竞争力，并为他们跻身政界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① 《北岭徐族宗谱·荣村公得降盛言》（1884年）。

② 《北岭徐族宗谱·徐君德琼行状》（1884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③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46—54页。

④ 张莉、张清华主编：《十大官商》，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296页。



徐荣村的“荣记湖丝”在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所获的奖状



徐荣村画像

其三，香山买办也是上海新式企业的积极投资者，较早地实现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变。

香山买办在与外商密切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到新式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其他阶层的人形成同样的意图之前，就率先投资于新式企业。像众多的买办那样，香山买办通过收取佣金、经营私人商业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迅速成为开埠后的上海社会新贵。^① 徐润在19世纪70年代个人资产就达341万两，其中房地产占223万余两，股票投资82万两，典当、钱庄等36万两，可谓“富甲王侯”，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豪。受外商和西方文化影响，香山买办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庞大开支的同时，也尝试将部分资金投入到新式工商企业中去，以牟取更大的利润。不过，早期他们

^①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五章的相关资料；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82页。

更喜欢以附股的形式，在外资企业中占据一定的份额，以获得资本的迅速增值。华商附股或依附洋商，是开埠通商后常见的一种投资活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早期华商，首先面临的是横遭封建统治者挫抑扼杀的巨大现实危险，不隐身于享有特权的洋商，也就完全失却了自身存在的可能。郑观应曾感同身受地说，早期轮船商“不乐自居华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原因在于“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①。有人更直接地指出：“今日中国路矿公司，非美商即英商，非德商即日商，至于为何行轮从前华官阻之不能行者，今外人皆一一占其利矣。凡此之类，其间非无华商之股份，然不过十之三，而此十之三，不附于洋股，亦不必不能成。即全系华商股份，而不挂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若夫洋商出面，则不然……夹入条约中为特别之利益，可省一切上下之需索。”在当时华商、买办的利益既不受外国法律的保护，清政府《大清律例》也不为其护航，他们自然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②李鸿章就承认：“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等行，华人股份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③香山买办到陌生的上海和江浙等地从事买办或工商业，面对陌生的生活工作环境和熟悉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自然需要寻求保护者和支持者。

唐廷枢就是英商创办的两家小轮船公司，即公正、北清轮船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1870年他向英商怡和洋行经营的一艘轮船“南浔号”投资30000两。^④英国轧拉佛洋行在1867年组织的公正轮船公司时，股东名单中就有唐廷枢和郑观应等香山买办。^⑤对怡和洋行来说，唐廷枢“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⑥。郑观应、唐茂枝、徐润等香山买办，同样地积极参与外商在轮船航运业方面的投资。^⑦在其他外商投资兴办的工商企业里，香山买办也有大量的附股活动。^⑧香山买办热衷于参与外资企业的附股搭办活动，其动因恰如郑观应本人在解释船舶修造业中华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第54页。

②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5—1126页。

③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下，第919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60年版。

④ [美]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第165—169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事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⑥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事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⑦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537页。

⑧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第483—537页。

商附股活动时所言，“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洵为良策。无如造船各厂，不能造新式之船，价比外洋更贵，所以租造者，至今尚属寥寥。盖洋厂机器日新，价廉功倍，以故群商权利，乐就外洋，往往有华商集款，附入西人公司股份，不愿居华商之名者，一则因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再则

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①。在郑观应等买办商人看来，附股搭办是投资兴利的一种比较稳妥而又实际的做法。这种现象表明香山买办较早地对西洋工商业方面的财富来源有深刻的印象，对外国人的商业运作、信用原则等均有较全面的了解。早期香山买办附股搭办的对象大都集中于外国轮船公司，因为航运业有利可图，也是有前途的新式企业。投资于外国轮航公司，也说明香山买办较早地意识到交通运输对于工商业的重要性。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71年海底电线铺设成功，引起了中西贸易方式的重大变化。在华各大商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和收取佣金的代理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性”业务上去。其中“代理经营制度”^②的出现和洋行资本在生产领域的进一步扩张，也为买办和华商资本进入近代企业提供了流通渠道。附股搭办因而成为买办商人投资于外资企业的一项重要途径。

不过，附股搭办不是香山买办的投资重点，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投资新式的工商企业，以便迅速从中牟取暴利。其中，地产业在迅速扩张的上海，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投资领域。宝顺洋行的大班就曾劝告徐润：“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贡数语，如扬子江路（今中山东一路）到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



1878年由唐廷枢签发的开平矿务局的股票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船政》。

② 《聂宝璋集》，第86—88页。

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至美租界各段地段，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① 徐润自己也敏锐地观察到：“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外营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② 因此，徐润于 60 年代任洋行买办起直到病逝，对房地产业始终情有独钟。在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均有他的地产，其中上海的地产最多。^③ 在被招商局革职前，他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到 233.69 万两银子，所拥有的地产已达到 3200 余亩，已建房地产约占 1/10，其中建有洋房 51 所，楼房 3 所，住宅 222 间，平房街房 1890 余间，当房 2 所，每年可收租银 12.29 万余两。^④ 在当时，人称“地产大王”。

与其他地区的买办不同的是，香山买办格外倾向于兴办近代工矿企业。19 世纪 60 年代后，清政府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意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香山买办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几乎参与了清政府创办的所有大型工商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管理活动。尤其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轮船招商局，第一家大规模的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煤矿，第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的设立，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为首的香山买办，不仅在资金上予以极大的支持，而且直接参与了创办和经营管理活动。^⑤ 据郝延平研究，郑观应在 19 世纪末中国的近代企业中可能投下了 40 万两银子，唐廷枢在开平煤矿就投入了大约 30 万两银子。徐润的自传显示，到 1883 年，他以股票形式在各家近代企业中总投资已有 127.5 万两。另外，他还是上海八家当铺的合伙人，投入的资本总额为 34.8 万两。^⑥ 唐廷枢、徐润受命于轮船招商局危难之际，却能令招商局起死回生，并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下获了较大的发展，就初步显示了香山买办的才干和胆识，也很快赢得了清政府地方实力派和洋务派官僚的重视与信任。^⑦ 徐润还与唐廷枢等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

① 转引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第 32 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68 页。

③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68 页。

④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68 页。

⑤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151—159 页。

⑥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121—123 页。

⑦ 汪熙：《求索集》，第 23—68 页。

济和火险公司。^① 1882年唐茂枝和李松云，在上海大量投资于外商控制的中国第一家电力企业——“申光电灯公司”，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

香山买办不仅自己投资于近代企业，而且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吸纳更多的买办资本和社会资本，以支持洋务企业的建设。近代洋务企业在创办之初，想筹措足够的资金其实是困难重重。李鸿章在筹办招商局时就感慨地说：“唯招商一节为最难。奸商贪利把持、弊固百出。其正经殷富者，又不愿与官交涉。盖中国官与商，情谊久不联属。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几成通病。不似西洋之官商合一，痛痒相关。是以遇有此等大举，往往有呼无应，非尽由巨资之少也。”^②

然而，唐廷枢从同治五年（1863年）正式成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在沪、津等地的商业活动，例如集资、附股等，始终都与在沪、汉等地经商致富的乡亲们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在经济上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一旦以唐廷枢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商场或官场失势，他们的同乡也就跟着从商场或官场撤退。如1879年郑观应离开上海织布局以后，原来通过他募集的一些粤籍买办（主要是香山买办）也紧随其后从织布局撤出资本。^③ 1885年唐廷枢与招商局脱离关系后，同唐廷枢关系密切的“存局各户纷纷提款”，退出招商局。^④ 与此同时，徐润由于挪用公款被迫离开轮船招商局，结果与徐润关系密切的股东纷纷要求退款，导致“直督拨银计六万两以支危局”^⑤。香山买办和商人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在商场和官场上的荣辱与共，直接影响了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发展。

在唐廷枢族亲中，有唐瑞芝、唐朗山、唐翘卿、唐翼衡、唐芝耘、唐廷植、唐廷庚、唐纪常等，以他们为主体的唐氏“买办世家”，控制着皖、赣、闽、苏各省的茶叶资源。他们还先后参与了怡和、太古、招商局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事业及国际航运事业。他们利用所能控制的航运力量，把中国的茶叶销往欧美、南亚，把中国的土特产运销北美、东南亚、中南美等地，也依靠招商局和清政府的力

① 中国保险协会等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1页。

②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4页。

③ 《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

④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3页。

⑤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3页。

量，为中国的航运事业的发展和权益的保护，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年，许多“唐家人”都在香山买办占据的各级机构中工作，并得到同宗和同乡的格外关照。后来，作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在1866年至机昔的函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只要我能腾出几分钟时间，我总是帮助我的本地朋友工作，他们全都要我代表他们和外国洋行做生意。为了照顾他们的利益，我已经被他们推举为工整和北清两轮船公司的董事。”^①显然，唐廷枢所说的“本地朋友”，无疑是附股于外国在华股份公司的，与其有相同地缘、业缘、血缘关系的香山买办。因此，在当时内外商业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这种地域性和宗族性的买办群体之间的相互呼应，有效地使大量的个人财富得以积累。而香山县唐家村的族产、庙产、私人财产和公共事业，也因为他们的捐赠获得了迅速的增长。^②

其四，香山买办还热心于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

与其他地区的众多买办一样，香山买办在参与创办一系列近代化事业的过程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资本后，也主动地参与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仅为诸如运河、道路、桥梁等公共工程筹集和捐献资金，而且创办和资助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唐廷枢就曾协同上海英领事麦华佗和傅兰雅等创办格致书院，^③协助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④支持兴办学校，是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建立英华书馆的积极倡导者和捐资者。^⑤徐润也是上海格致书院的董事，郑观应更是兴办上海格致书院的热心人，多次参加格致书院的命题课艺活动。^⑥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香山买办，还是中国幼童出洋留学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1872年徐润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委托，办理挑选出国留学生事宜。自1872年至1875年，徐润以其独到的眼力和坚忍的毅力完成了这一使命，先后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挑选120名幼童到美国学习。尤其是香山籍的留美幼童占了总数的30%以上，在当时可

①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64页。

② 唐有淦：《唐家村史》，34—35页。

③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杂记》，第304—305页。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⑤ 《申报》，1874年6月18日、9月4日。

⑥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1页。

谓开风气之先。^① 1882年，徐润见英国出版商采用影印工艺来印刷图书，便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雇用了五百多名工人，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搜集善本，陆续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中国典籍，出版大量的西学图书，介绍西方近代文化。他在北京宝文斋觅得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和《资治通鉴》等书，陆续加以石印，营业相当兴旺。所印书籍中，规模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成本浩大，书局乃创用预约订购的办法，印了1500部，书局因此名声大振。1890年，总理衙门向同文书局订购《古今图书集成》百部，增入考证20卷，凡5044册，至1894年印成。此书印刷精美，用纸考究，每部值规平银3500余两，被总理衙门用作赠送外国政府的礼品。石印《二十四史》的规模也很可观，共印1000部，每部100大洋。同文书局所印书籍，字迹清朗，装订精美，很受社会好评，被学术界称为“同文本”。民国《上海县志》记徐润有关贡献：“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②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还积极参与普育堂、医院等项社会公益与慈善活动。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不仅是上海广肇公所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而且一直热心于公所的公共事务。唐廷枢和徐润在担任公所董事期间，认真承担义务，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同乡办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好事。^③ 1870年上海《教会新报》就有关于他们施粥救济灾民的报道：“普育堂绅董吴炽昌、唐廷枢、刘家驷、瞿世仁等举行施粥，于丝捐内提银，永远长施。”^④ 徐润自己也有类似的记载：“上海医院以山东路仁济医院开设最早，设有中外董事，唐景翁与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格致书院，唐与余并为董事。”^⑤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在上海洋行做买办时，也积极参与赈灾活动。1882年9月16日的《申报》中就有相关的

① 胡波：《容闳与中国近代化》，《求索》1999年第4期；《香山与近代中国》，载《香山建县8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熊月之等：《上海通史》第六卷《晚清文化》，第92页。

③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72页，另见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④ 《教会新报》，1870年3月19日。

⑤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4—15页。

报道：“咸丰初，先生客沪上，时江南军事起，劝饷甚急，先生家仅中人赀，竭所有以应，人多激发乐输，盖物望所归，故动而有功如此。先生性慷爽，慕义乐施，尤笃于本支。年四十，稍稍致赢，即令诸子继事，而身自归里，倡置祭田，恪共祀事，三党贫乏周恤之唯恐不至。”^①

其五，香山买办较之其他地区的买办更热心政治，积极参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香山买办群体中，既有像吴健彰那样从买办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僚的买办商人，也有像郑观应那样关心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洋行买办。当过洋行买办、做过上海道台的香山人吴健彰，是第一个试图雇用外国军队和军舰去同太平军作战的官员，也是条约口岸型的中国商人官僚最初的典范。他通过操纵中外交往和对外贸易，使其寄生的道路趋于向上。他的提升甚至被认为标志着“夷务”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责和任命道台的一个标准。^② 其实，香山许多买办或商人都有从买办到绅商再到官商的经历。徐钰亭、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唐廷植等香山买办商人，都曾积极捐纳科举功名和官衔，成为有名誉和官衔的绅商或官商。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在为洋行出谋划策的同时，还格外关心中国政治的改良和社会的变革。容闳不仅向太平天国提出发展近代化的七条建议，而且还直接参与了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洋务运动。^③ 徐润、唐廷枢等同样在洋务活动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86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利用中西商人的税捐建造了一座“公家花园”，供游人娱乐，但建成后，只准外国人进出游玩，不准华人入内。1885年11月唐廷枢、唐茂枝、陈咏南等八名著名粤商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解除园禁，准许华人进入公家花园游览。他们在致工部局的公函中，根据西人所执的理由及实际情况，提出了几条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办法，有理有节地提出向华人开放的要求。事情起因于1881年4月6日，虹口华绅颜永京、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等入上海黄圃公园被阻，引起交涉未果。1885年，寓沪绅商陈咏南、吴虹玉、颜永京、谭同兴、唐茂枝、李秋坪、唐景星、陈辉庭等人再度联名具函抗议，要求工部局取消不平等待遇，并提出有条件开放的建议：1. 设华人游园证，由工部局凭界内华人著名人士

① 同人公启：《郑秀峰先生八旬开袞征诗启》，《申报》1882年9月16日。

②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73—75页。

③ 容闳著，石霓译注：《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介绍填发，或由著名华人组织委员会填发。2. 每周指定二、三日为华人持证游园期。3. 添辟公园，以便不论华洋人民，均不自由入内。他们认为“就权利言，自当不分国籍，一体待遇。而我华人，更居于地主之位，应得自由出入，以联兵主之欢，敦两国之谊。乃今工部局定章，东西各国绅商，不分畛域，咸得入园，独我中国人士，反遭摈拒，其不合情理，可谓无过于此矣”。强调“商等非以其园风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后快，诚以其基地既属中国官地，其费又大半取诸华民捐税，而中国人民，反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小之足以辱及个人，大之丧失国家尊严，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于何等地位！”^① 在华商的积极活动和华人舆论的压力下，租界当局终于在次年5月解除了公家花园对华人之禁。在这次争取华人入园权利的过程中，粤商特别是以唐廷枢、唐茂枝为主的香山买办起到了相当大的带头和实际推动作用。^② 此外，在香山买办群体中，郑观应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他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家，也是“兵战”不如“商战”的积极鼓吹者。他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香山买办这种对名誉和官衔的看重，以及对政治、社会现实的改良与变革的热情，既为他们在上海等地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又为他们在工商业方面的继续发展惹下了不少麻烦。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在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历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三、香山买办与近代上海社会

开埠前期的上海固然“百肆喧闹，万物充轳”，海商兴盛，“有富乃百万十者”，甚至出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馐招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的繁华景象。但是，十里洋场，繁花似锦的上海，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迈向现代，显然是在开埠之后的事情。有的研究者就指出：“上海在古代就是个以商民

① 秦理斋：《上海公园志》，《上海导游》，国光印书局1934年版，第326页。

②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579—582页。